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抗拒遗忘】	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	阎长贵
【童年旧事】	一个红小兵的故事	阮丹青
【往事非烟】	革命一年半（北京65中文革）（上）	逍遥亦南
【史海钩沉】	“小混蛋”之死	米鹤都
【当事者说】	都说我打死了小混蛋	王南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抗拒遗忘】

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

• 阎长贵 •

201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的评论，现在从网上很难查到，要想下载都仿佛不可能了。这是为什么？它表明了什么？我觉得表明，迄今关于“文革”仍然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究竟是罪责，还是功绩，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应该说，厘清文革真相是当今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鄙人不揣疏漏，大胆（或者说：冒昧）地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被称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文胆”的骆小海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成员之一的宋柏林出版的红卫兵日记《红卫兵兴衰录》（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6月）所写的《序》中说：“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关于“文革”的评价更广泛地流传着“浩劫”和“十年浩劫”的说法。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让事实说话：

1966年8月，即所谓“破四旧”时期，北京市的老红卫兵在全城大肆抄家。所谓的“抄家”常常是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还伴随“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甚至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被红卫兵押着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的一对“资本家”老夫妇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

一个老太太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一个本来应该很温柔善良的少女残暴成上文中的那个模样，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毁灭人性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在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中，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妇）被一群红卫兵用开水从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烫熟了还不肯罢手，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爬满了蛆。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首都，是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这里尚且发生如此野蛮疯狂的闹剧；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远离北京的其他地区会发生怎样的血腥罪行。如湖南道县对“地、富、反、坏”所谓“四类分子”斩草除根的大屠杀，有80多岁的老人，还有几个月的婴儿。文革期中，广西一些地方掀起吃人狂潮。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如此等等，如此等等，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和造成的，这不是“大灾难”、“沉重的灾难”即“浩劫”，是什么？

我读过一篇题目叫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浩劫（破四旧）——多少国宝付之一炬！》的网上文章，其中说，九州大地各种珍贵遗物遭破坏毁灭的“罄竹难书的痛心史实”，不能以拍卖行的估价估计！“当年红卫兵在大火中砸烂旧世界，老奸巨猾的康生却在劫火中精选了上千件文物据为己有，这大约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一点贡献吧！”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又多么幽默。我曾有幸到安徽亳州参观以砖雕、木雕闻名的花戏楼（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该楼于400年前由山（西）陕（西）药商聚资兴建。楼上雕刻精美，其人其物，皆玲珑剔透，活灵活现，真是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不少参观者问及：花戏楼为什么在“文革”中没遭到破坏？讲解员说：当时这里驻有解放军，他们用泥巴把雕刻都糊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造反派不敢动，因而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听到这样说，大家都唏嘘不已，一则赞扬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和智慧，他们对付造反派的办法如此巧妙和高超；同时又有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灿烂辉煌的国家级瑰宝居然要这样保护，真是可叹也夫！可悲也夫！“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就是文物大破坏、大浩劫。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172万8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13万5千人，武斗死亡23万7千人，7百零3万人伤残，7万1千2百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3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2千万。

再看经济。由于“停产闹革命”，由于武斗，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79年12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据统计，按每百元积累的国民收入计算，在“文革”十年间，“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6元，都少于“一五”时期的35元，而且越来越少。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3元。从总体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对经济也是大破坏、大浩劫，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不用再说了，“文革”是“浩劫”，这在历史上已是铁板上钉钉，谁也抹杀不了，否定不了。

应该知道，“文革浩劫论”并不是“文革”后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并不完全是“事后诸葛亮”——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是“事后诸葛亮”，这没什么奇怪，因为错误往往事后才看清楚，这就是所谓总结和吸取教训，也非常需要。我这里想说的是，在“文革”中，还是“文革”早期，就有人公开提出“文革”是“浩劫”的论断了。一个是“文革”结束后又被枪杀的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他在“文革”初期即1966、1967年的日记中就写到：“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参见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一个是上海音乐家陆洪恩，他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所谓有“恶攻”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在行刑前，即1968年4月20日，当局问他究竟是要死还是要活时，他愤怒回答：“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由于他态度“顽固”，他于1968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时年49岁。（参见网文《陆洪恩的故事》）不难看出，“文革浩劫论”实实在在是用鲜血换来的啊！

在“文革”后，明确提出“文革浩劫论”的权威人士是胡耀邦和邓小平。1980年6月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个月的胡耀邦提出了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遗留的问题，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正是根据“文革浩劫论”的思想，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指导起草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到现在“文革浩劫论”的观点仍活在人们的口头上和媒体上（如2018年6月8日《北京日报》“长安观察”栏目《从四十年高考变迁体察中国社会进步》的评论说：“对于刚刚摆脱十年浩劫徘徊于历史路口的中国来说……”）。

又，2018年6月18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131期有一篇署名吴敏的《“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其中有云：“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十分显然，“文革浩劫论”确实铁板上钉钉，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然而最近，在网上读到2016年4月发布的一篇长达2万多字名为《文革炼狱》的文章。该文坚决而严厉地批判“文革浩劫论”。他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将文革鞭笞为比法西斯还无以复加的‘亘古未有的千古浩劫’”。

很显然，该文作者不同意“文革浩劫论”，判定这是资产阶级观点。而他又怎样认识和评价文革呢？我们看看他的说法。他的论述很多，没法尽引。我们只摘录他几段结论性的观点。

他说：

——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和完善。

——从文革设定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看，文革确实是一场深刻的、广泛的和激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是实现了它大部分的目标和任务的，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文革遗留的思想遗产很丰富。这主要：一是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二是用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武装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三是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树立全社会的平等思想。

又讯：（2018年）5月25日，100多名示威者出现在香港九龙地区的中心地带。他们手持毛泽东肖像画和印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等内容的牌子。该集会的目的是纪念由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52周年。参加集会的人不仅有香港居民，还有来自内地的极左派。他们高喊：“不要忘记毛泽东思想。”为了保护他们的街道游行，香港警察列队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他们之所以选在香港举行集会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无法获得许可。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定义为“社会剧变期”，持批判的态度。包括毛泽东主义者在内的中国极端左派批评中国共产党正在远离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张，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追求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不但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且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有位退休的局级官员2017年撰长文，称赞文革有九大功绩：

一是实行了当代最广泛的思想解放。

二是实行了当代最实在的自由。

三是建立了当代最广泛的民主制度。

四是推进了当代最进步的改革。

五是形成了最好的社会风气。

六是使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

七是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都进一步加强。

八是有力促进了经济建设。

九是使外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他认为，上述客观事实充分证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步”以及他们所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结论，都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必须彻底推翻。

还有人赞同这种观点。他又概括出文革的三大历史功绩。

一、推翻了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压迫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二、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资本和自然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个人财产的社会基础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

三、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建立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造反夺权、人民当家理论体系。

结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否定社会主义。
如此等等，还是宣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

综上我们关于“文革浩劫”的论述，可以看到，文革决不是什么“万岁”，而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它虽然已经终结四十多年了，但怎样认识和评价“文革”的斗争还鲜明而尖锐地存在着。“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我们如果不正视这场斗争，并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文革浩劫”还可能重演。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任何人都千万不可忽视和轻视！

（写于2018年7月）

~~~~~

## 【童年旧事】

### 一个红小兵的故事

• 阮丹青 •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8岁，住在北京。我们的院子里住了几十户人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宿舍。那时候好像常常可以不上学，就在家同小朋友们一起玩儿。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在艺术圈里，剧作家，画家，演员，导演，和从事戏剧教育的老师。那天早上，好像是小超子来找我，说是有行动。我们大概7，8个男孩儿女孩儿吧，最大的那个大哥哥应该12岁了，他在上小学六年级。我们要去抄家，抄地主婆的家。

地主婆是王奶奶，就住在我们院子里。她的儿子是学院里教舞台美术的教师，大概不到四十岁吧。他没有结婚，也不怎么说话。王奶奶也是不怎么说话的人，母子两个安安静静过日子。

我们把王奶奶叫出来，让她老实交代，家里是否藏有变天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了。我们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抽屉，衣柜里的东西，通通拿出来，扔到屋外的地上，一样一样的审查。我记得我和小丽丽把王奶奶的塑料花一束一束的撕碎，一边撕一边笑，开心极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破坏的快感。没有人看的出来，我们这两个小女孩儿将来一个会成为主治大夫，另一个会是大学教授。大哥哥后来也是国企高管呢。

我们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一个大人出来管我们，都在上班，没上班的，估计也不敢出来说话。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在班上挨批斗呢，他们都是“牛鬼蛇神”，是黑帮。我妈妈被关在学院里，不能回家。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奶奶的儿子回来了。他向我们请示，“我可以给这个地主婆做午饭吗？”我们批准了他的要求。我觉得特别可乐，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这样卑躬地说话。

下午，我们要求王奶奶跟我们去上缴我们搜到的封资修的坏东西。我们走在胡同里，王奶奶走在我们中间，我们好像一路喊着口号什么的吧，反正动静不小。不少人围观。这时候，一个中年女人突然走出人群对我们说，“你们闹什么闹？！你们都是黑帮的子女，你们有什么资格批斗别人？！回家去想想你们的爸爸妈妈的问题吧！”我们一下子就愣住了。不

过，我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大哥哥说，“黑帮的子女就不能革命啦？！你破坏革命运动！”她就住在附近。我们马上去了她家，把她家的门上，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批斗了她一番，她也只好低头认罪了。

不记得那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几个月以后，听说王奶奶的儿子自杀了。好像是他被告知，若是不好好交代问题，就要给他升级，会把他跟更坏的人关在一起（就是跟我妈妈他们那些院级的领导大黑帮们关在一起）。他大概是受不了，上吊自杀了，就在学生宿舍楼的后面，那里有很多很粗的钢筋。我们常去那里玩儿。记得我们还在那些钢筋上伸着脖子试着玩，还说，“王 XX 是在哪根钢筋上吊死的呢？嘿嘿。”

王奶奶的亲戚把她接走了，他们没有告诉她儿子去了哪里。我从此也没有再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多想这个事。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不经意地提起，当年她挨批斗的时候，她的一个学生走上来打了她一个耳光。我听到后，差点儿疯掉，好像所有的血都涌到了头上。那个学生的儿子跟我在同一间中学读书，那些日子，我天天盼着他被大卡车撞死，因为我觉得那是惩罚他的爸爸的最佳方法。

直到我大学毕业，去美国读博士学位，才良心发现。我做过很坏的事情！连王奶奶的儿子的死都可能同我们有关呢。他不单是自己在学院里受侮辱迫害，自己的妈妈也被小孩子们侮辱迫害。

我的美国博士导师说，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人，造成小孩子们都可以胡作非为的局面，那些人是真正的罪人。

也许吧。

Sunday, January 31, 2016

后记：昨晚去看了电影，《十年》。电影院里全是年轻人。演到第四段的时候，我在哭，观众特别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觉得非常恐怖。我宁愿这些年轻人哭出来，大哭一场。看完电影，跟一个香港朋友一起吃晚饭，我跟他讲起我的红小兵经历，差点儿又哭起来了。今早跟一个犹太好朋友聊起此事。他说，你当时才八岁，就不要责备自己了。不过，你可以把这件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这是我减轻罪过的唯一方式。

□ 原载《记忆》2016年5月31日第十期

~~~~~

【往事非烟】

革命一年半（北京65中文革）（上）

• 逍遥亦南 •

按老话讲，我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没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搏过命，没有争取当个烈士、英雄啥的幸运。这里的“我们”不包括一代人，特指我和我的先生刘小佈，“革命”则指1966年5月到1967年11月我俩自愿报名到内蒙古插队之前，也就是在北京65中学的一年半。打旗的是小佈，我大致属于跑龙套的角色。

那年我们正上高三，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的考试成绩还算出色：七门功课中五门一百，另两门也在九十五以上。当然，可能出的题目容易，我占了个便宜。当时的心气儿颇高，想要学医，将来当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浪漫的愿望中，第一志愿想报中国医科大学；现实中想到出身不好，不过一介白丁儿，连团都入不了，泄气到能否有大学录取都没把握；间或也半梦半醒着想，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学校里年年发优良奖状，虽从没有排过全校的名次，要排肯定也会在前十名之列，又不属于“杀关管”子弟，怎么说也该有大学上吧？

小佈与我不同，他父母都在1945年参加了解放军，他随姥爷长大，老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是水电部的党组书记，出身当然没问题。他的学习成绩也在天天向上，那时已名列前茅。他的问题是能否考上清华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问题。姥爷对他讲：考不上清华你就别回家。他的压力虽不小，只在成绩的更上一层楼。而以他的聪明，只要继续努力，似乎问题不大。

复习课在继续，志愿尚未填写，报纸上便开始批判“三家村”，接着是北大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初开始，大家就停课只闹革命了。

刚开始，我们没跟上趟儿，属于被动观望型。一方面，我们继续沉浸在两人世界，在地下爱情中漫游；一方面，仍旧处于发懵状态，还没从大学梦中苏醒呢！

说起这段地下爱情，也是阶级斗争逼出来的。小佈本来是依靠对象，可他不识时务，是同学中唯一拒绝写入团申请书、不与我划清界限的人，在利益面前他不为所动，甚至屡屡为我报不平，说我父亲是民主人士，并不反动，也不怕以身犯众怒。这点他随母亲。他母亲虽然出身高级革命干部，但从小随地主祖母长大，生活在旧时的北平，上的是教会的贝满女中，后来又教会大学辅仁大学学习教育，参军后才去的解放军军医大学学医，后来便一直做医生。她骨子里是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总愿与谈得来而出身不好的大夫泡在一起，领导谈话都不肯划清界限，甚至为此入不了共产党都无所谓。小佈的姥爷、姥姥为此感叹，孩子没教育好，当年不该把她留在北平，应当早些带到延安才对……有这样特立独行的母亲，有如此我行我素的儿子就很正常了。

尽管我和小佈的出身背景迥异，兴趣爱好有很多差距，但团支部的高压竟然将两种不同的材质锻压为合金，分子均匀分布、完全融和在了一起。当然，这里有催化剂的作用：少男少女，都读了些憧憬美好爱情与自由的书，更渴望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

革命一来，首先是大字报满天飞，学生积极的也有，但主要是老师给校领导贴提意见的大字报，走在最前列的是青年教师。大潮冲击下，我俩也不能完全不为所动，曾和几个同学一起，给班主任齐老师贴了张大字报。这位班主任是共产党员，还是数学教研组长，却很有意思，对什么都大撒手，一贯取任而不主的态度。高二的班主任周老师曾为我的事情与团支部发生过激烈冲突。他们反对给我发优良奖状，可周老师认为，我的操行评定是良，不属于品质和行为恶劣的学生，没有理由不发。而到了高三，团支部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班会上他只是哼哼哈哈，基本不做任何表态。他是教我们解析几何的，上课却不讲课，叫一位同学走上台去念一段书，他坐在旁边看报纸，最多布置一下作业，然后便叫我们自己看书，这就是他所谓的教改了。

我对数理化没有特殊爱好，每次考试成绩不错就满足。但小佈深爱数理化，他的志愿是当个造火箭的工程师，觉得自己的解析几何没有学到家，达不到他预期的高标准，所以对齐老师很不满意。大字报是在他提议下写的，当然由他执笔。那时的我已经底气不足，只能跟

着跑龙套。但我们没有上纲上线，没有揭齐老师的历史问题，也没有说他的出身不好，只说他打着教改的旗号糊弄学生，对工作敷衍塞责。根据其他老师的揭发，他这后两项很有些问题，也无怪乎他啥事不管，这就是他的滑头或曰聪明吧？

说实话，十几年背书式的教育确实死气沉沉，早该改改了。团支部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整右派学生，搞得出身有问题的人心惶惶，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些都是淤积在我们心中的问题与不平。因此，我们觉得给校领导提意见没错，看着那些大字报挺顺气，但也没想过把他们往死里整。

6月中旬左右，团中央派的工作组来到我校，前后脚儿，中央决定高考暂停。停止高考在我虽有些失望，却没有五雷轰顶的感觉，甚至还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再不会由于出身不好而落榜，这回大家终于平等了。我将平等看得高于一切。

工作组依靠的还是当初学校的那批骨干，但基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的子弟，几乎是按父亲官儿的大小来排队，出身平民的这回就靠边站了。例如，师生代表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就是姬鹏飞的儿子。但他和我们班那些班干部不同，三年来一直品学兼优，体育也很好，过去是篮球场上小佈的老对手，人并不张扬，在学生中挺有威望。

我们班基本还是团支部或学生干部掌权，牌在高一就基本洗过了，自然分为了两派，对立派还是以小佈为首，那些曾经与我们交好的同学又团结在了我们周围。有一点颇为讽刺，整我最厉害的一位女团支部委员，忆苦思甜时曾上台大讲母亲的血泪史，这时却传出她父亲是破落地主，母亲是地主的小老婆，但因为有另一整我们的男班干部罩着她，他们内部没人整她。而整人又不是我们的强项，我已吃够了这种苦头，更不会想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在心里有点儿瞧不起她。细想之下却也有些佩服，有几个像我这么傻的，父亲明明在解放前就参加了民主运动，却听他的话，将出身填写成“旧军政人员”，以为自己对党忠诚老实，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这所学校只有高中不设初中，那时社会上整校领导的声势已经很凶。我校在大潮冲击下，给校长、团委书记等戴高帽游街和打人都发生过，但不算特别凶狠。

我和小佈历来对校长印象欠佳，校长对学校基本事事不抓，做报告也讲不出任何实质性内容，只会打官腔。运动初起，老师给他贴大字报提意见，他却妄图转移视线，竟然找了几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谈话，威胁要将他们的档案抖搂出来。有个姓王的老师，上大学期间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时曾有过所谓“右派言论”，虽没打成右派分子，却已记录在案。这一下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学校的楼道里突然跳了出来，大叫大喊，扬言要和毛主席拼命。并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施政纲领和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乱语，但已足够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猖狂进攻了。在工作组和师生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下，将王整得很惨，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拳打脚踢……当时，我和小佈主要是震惊，惊异王怎么会跳出来喊叫这番言论。因教我们语文的穆老师悄悄告诉了我们真相，我们不觉对王心生同情，但也无能为力，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监狱（运动后很快平反了）。我们觉得校长办事太损，竟然生生将一个老实人逼疯了。由于心里并没觉得王是反革命，便只站在很远的地方观望，态度消极。

我俩对团委书记的印象更坏。此人整天慷慨激昂，吐沫星子四射地大讲阶级斗争，那份装腔做式的模样令人在心中做呕。他整人也狠，例如我们班的何景仪，听说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业主，而是地主，他就提出要开除人家的团籍，搞得人家有好几个月精神到了分裂的边缘。几乎尽人皆知，他的作风也有问题……在批斗他时，小佈忍不住上前，从背后给了他一巴掌。事后他还得意地对我说，这回解了点儿气！我从来反对打人和打架，当然很不赞

成。他跟我不同，从小玩儿的是打打杀杀的游戏，看的是《三国》、《水浒》，其中《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一直是他的偶像。从我认识他起，没少看他与人打架，但他打人不能见血，雷声大雨点小，孩子撒气而已。

工作组一来就反对将矛头指向校领导，主张全面开花，大揭盖子，很像当年的反右派。特别是那位组长，对普通老师的态度极坏，在全校大会上破口大骂那些给校领导提意见的老师。在他引领下，开始给老师们上纲上线，几乎是一个个过筛子。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历来爱当老师的向日葵，特别喜欢围着老师提问题。不知道是团支部的几位怂恿了向日葵，还是向日葵主动向团支部的几位表功，他们突然贴大字报揭发穆老师，说他讲过：“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据此将他打成反革命。一时间，墙上堆满了声讨穆老师的大字报，有老师们的揭发，更有诸多同学的声讨。我记得穆老师那些天主动将分头剃成了光头，无论见到谁脸上都没任何表情。

运动开始，他曾和当时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给校领导贴过不少大字报，这下引火烧身了。这些年轻教师都毕业于重点大学，若不是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编制缩减，也不至于分到中学当教书匠。虽说有点大材小用，但他们教书都很敬业。就说穆老师吧，教学一贯灵活，不死背课本。由于他历来关心政治，在语文课上还不断给我们讲时事。向日葵的揭发，就根据他让我们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据后来小佈告诉我，下课后，向日葵脸上挂着无暇的微笑，向穆老师提问：反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穆老师是拿毛泽东主席的话回答她的：宗教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爱国宗教人士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天真的笑仍旧挂在向日葵的脸颊上，仿佛对能从穆老师那里学到真理与知识很感激。

我是穆老师的得意门生，在感情上自然会同情他。特别是当时的父亲也与穆老师的情况近似，所谓唇亡齿寒，人同此心。而小佈自从穆老师教课，在作文上有所翻身，他觉得穆老师关心政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他颇有好印象。

小佈对工作组组长的态度原本看不惯，将穆老师打成反革命，无疑成为了导火索，他异常愤怒地对我说，还不许给领导提意见了？真他妈装孙子！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说不说，事后下刀子？他觉得做人不能将人往死里整，更要当面锣对面鼓，不能搞猫腻。

愤怒中他还推门走进教研室，找到那几位积极揭发穆老师的教员，指着他们的鼻子吼，不批你们，你们还不老老实实呆着，互相乱咬，咬什么咬！那模样估计很是不善，吓得那几位一句话也不敢回。

然后，他提议我们几个也写一张大字报，指出在工作组领导下，现在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不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该把矛头对准普通老师。大字报是他起草的，为保护我，他也不会让我写。穆老师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一时动员了共十一位同学签名。我的字写得相当糟糕，没有誊写大字报的资格，只有随大流签名的份儿。

这一下我们成主攻对象了。同情反革命，也就跟反革命差不多，而且还敢攻击工作组，这不就是反革命的具体行动吗！工作组长在大会上直接把矛头直向了我們。

文革一起，讲的是造反有理。我们当时觉得这句话特别对我们口味，小人物被压制久了，一旦有了条件，不造反还能怎地！我们当然不服，小佈这只好斗的公鸡更难服气。他约上小名叫二蛋子的同学去找工作组辩论。当时，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也有不少人在场，立时形成合围态势，说我们贴的就是反动大字报。回来的路上，二蛋子委屈地哭了。明明是干革

命，怎么成反革命了？小佈安慰他说，咱们没错，哭什么！回家后，他向姥爷学说学校的情况，老人让他顶住，说他做得对。老革命都支持，这无疑对他和我都是很大的激励。估计就是没有老人的支持，以小佈的执拗，也不会低头认错。那时我没想过背叛，毕竟压力没大到飞鸟各投林的地步。

我们就这么死扛着，但十一个同学中的大多数却扛不住了，只剩下我们和另外两个，我挺知足，好歹不是孤军奋战啊！期间，“残渣余孽”们还到团中央去反映过一次情况。那时，我们才打听到团中央在台基厂。只见楼道里人山人海，一片乱哄哄。接待人员把我们的话记录下来，说会向上面反映的，以后当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没多久，就听到工作组要撤离的消息，我们很兴奋，似乎胸脯都挺高了几寸。工作组临撤离的一个晚上，陶铸突然光临我们学校。那年头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知道什么叫困，同学们大都连轴转，不分昼夜地商讨革命形势，筹划对策，然后赶写大字报。我们这几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当然也不例外，陶铸来的那晚我和小佈都在场。那时的陶铸已经是中央的第四把手，对我们学校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首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组要走了，你们学校的学生代表骨干表现不错，坚持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今后就靠你们这些小将，把学校管理好……这番讲话的明显含义就是要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工作组支持的干部子弟。陶铸讲完话，小佈无人自请走上台去，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自己会管理自己……意思是不用他给我们定调子。陶铸有涵养，听完他的讲话也没急，说还有事，很快走了。

工作组撤离大约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为核心的干部子弟组建了老红卫兵，想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想把权力接过来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学校里一时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压在我们肩头的山大有摇摇欲坠的趋势，我们的队伍又有些壮大起来。

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小佈的姥爷问他为什么没加入红卫兵？他说自己的观点和他们不一样。老人说，不一样你才更应当争取加入，打进去，改造他们。他觉得这话有道理，于是去向红卫兵的头头申请。都知道他是个大刺儿头，一旦进来，还不得像孙悟空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啊，谁敢要？这么着，被回绝了。

既然红卫兵不要他，他只有自己拉起一只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队伍，都是各年级与红卫兵有矛盾和不服从他们领导的，但出身都没问题，这里面当然不会包括我。只要加上了红字头，似乎谁都不能逾越这条障碍，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正常。成立另一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小佈不过是和老红卫兵叫板，实际活动中，我们还是以战斗组为单位，而我们班的这个战斗组什么出身的都有，甚至有个据说出身军统兼中统双料的女生，大家也一视同仁，一般执笔都是小佈和二蛋子，字写得好的刻蜡版，会写大字的抄大字报。

初进65中的我心性高傲，有棱有角。三年多来，在阶级斗争这把锉刀的磨砺下，已经钝成了一块易碎的木片。革命一来，我突然发觉自己一门儿不门儿，形同废物，最多只有跟着跑的份儿，丧气之下，易碎的木片裂成了碎末，再也拾不起来了。

不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正聚在小佈家里，商议写大字报的事情，他姥爷从后院走到他住的中院，很激动地举着个半导体，让我们听广播中的内容。双方都兴奋，觉得自己没站错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场运动将指向包括小佈姥爷在内的当权派，并且要彻底打垮。

也就是这年八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对联也在我校开始张贴，一时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声音甚嚣尘上，老红卫兵的头立马抬了起来，因为他们天然属于血统高贵的一群。

本该枪打出头鸟，对准小佈这只凶鸟，可他的出身抓不着什么把柄，柿子只有拣软的捏，我又一次成为他们的主攻方向。班里的同学给我贴了不少大字报，以红卫兵及其红外围为首，主力仍是运动前团支部的两员大将，一男一女。说我出身反动，本人也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因为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曾对某同学说过，江青原名叫蓝萍，是三流电影演员，当初和主席结婚，刘少奇等不同意……这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证人是说自己出身贫农实为破落地主的那员红外围。

这一棍子把我打傻了。在批判我的班会上，我都不记得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应当是毫无招架之力，只有挨打的份儿，很可怜，十分窝囊。那些当初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时只有站起来揭发批判我，最多也就是保持沉默。又一次树倒猢猻散的惨局。好歹小佈还坚决为我辩护，说我说的的是事实，没有攻击毛主席；二蛋子也说了几句。如今回想起来，能沉默就相当于不简单了，没能划清界限啊！而为我说话的二蛋子，他父亲是起义的国民党军人，能有此种勇气，至今叫我佩服不已。

不久抄家开始。老兵们都穿起绿军装，腰间系根宽皮带，有时还将皮带解下，在空中张扬地挥舞，皮带发出劈啪的脆响，金属的皮带扣撞击在木头上有碎裂声响。听说就用这皮带扣往人身上抽，阶梯教室中摆满了抄家来的东西……阶梯教室是为讲大课准备的大课堂，在当时的形势下，似乎叫阶级教室更恰当。

我从来没勇气去阶梯教室参观，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战士们。从那一刻起，尽管没体验过皮带扣的滋味，却觉得自己的脊梁骨已经断裂。断裂的脊梁骨搅拌着残存的骄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惧是油，点燃了痛苦之后变为一片麻木。

那时我的家里同样漫溢着恐怖气氛，抄家仿佛是迟早的事情。父亲已经把行李打好，随时准备以“公安六条”的身份被遣返回乡。至于南昌算他的老家，还是江西遂川算他的老家，那就全凭命运的安排了。

小佈仿佛也有预感，让我把需要保存的东西交他保管。在南昌时，大娘的子女都干革命去了，她却被划为地主。为了救已经被关起来的大娘，母亲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几乎是扫地出门来到北京的，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祖母给母亲的首饰，几件翡翠也在风声紧之前，以五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委托行，父亲穿西装的照片也全烧了……在我心里，最宝贵的是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我收集的主要是前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譬如像《白痴》中的女演员等。另一些是运动前小佈刚给我的，都是12寸大小的好莱坞著名男女影星的相片。那时没有美国电影可看，对着影子过过瘾，也觉得美丽非凡。

其实真有些值钱的是我积攒的邮票，从小学起我就开始集邮了。这得益于母亲在人民银行核算工厂整理组工作，全国所有往来的信件都要经她之手，信件一天就有上百封之多，邮票更多，都是盖销票，若不弄下来，就全当废纸处理了。那年头时兴积攒盖销票，因此我便有了集邮的兴趣。什么梅兰芳票，金鱼票，牡丹票，十几张一套的，别人很难弄齐一套，我却有好几套。多出来的就去集邮公司或与熟人换外国邮票，多年下来，积攒了好几册。解放以来国内邮票我已经攒齐了，其余几册则是外国的。

但我心里没有价值的概念。因为最喜欢影星的照片，也明白放在家里烫手，就只把这些照片放在了书包里，准备让小佈拿走。却始终没机会交给他，只好又拿回家里。

（未完待续）

~~~~~

## 【史海钩沉】

### “小混蛋”之死

• 米鹤都 •

（原编者的话：周长利，一个正史不彰、野史留名的狂野少年，江湖上久久流传着他的传奇故事。他被红卫兵乱刀刺扎时，至死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的名声可以与遇罗克并驾齐驱，一文一武的“平民英雄”。

周长利有一个更为响亮的绰名：小混蛋。他第一次出现在影视作品里，是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第一次出现在有影响力的书刊中，是《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推出的专题“一九六八年的北京江湖”。

这个把生命永远定格在18岁的北京“顽主”，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王朔、姜文、陈凯歌、王山等人作品里的精彩片断，“小混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王朔扮演的“小混蛋”在莫斯科餐厅被身穿军绿服装的“顽主”们高高抛起，在他的背后，是56个民族欢聚一堂的彩色壁画……）

#### ◇ 影视作品里的“小混蛋”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最后一幕，除去在座的几位当事人能说得清楚，其他的众多传闻大都是杜撰。”曹都都告诉笔者。

在2008年到2013年间，笔者多次访谈了事件的核心当事人王南生，重要参与者刘沪生、江小路，见证者王冀豫、曹都都等。当年，他们大都是北京“三校”（翠微路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统称“三校”，其生源大部分是部队大院的孩子）的老红卫兵。

笔者试图寻找死者周长利（即“小混蛋”）的亲友，遗憾的是未能联系到，只能根据能接触到的现有材料，呈现另一方的陈述和观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这一事件。

#### ◇ 结怨“红八月”

事情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革初期。

文革发动前夕，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保密级别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与闻。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

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部队指挥组、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清查）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之后北京出现的红卫兵打流氓、抄家、遣返等，都可从这一初始布局中找到依据。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名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之后，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授意下，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哪怕只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员，都由基层派出所提供名单、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个学校，实施“群众专政”。在这一过程中，多人被打死打伤，这一事件被称为“打流氓”。

由此，老红卫兵（又称“老兵”，指文革初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以干部子弟为骨干）和“流氓”之间结下了梁子，为日后双方的打群架埋下了伏笔。

到了1967年，对老红卫兵们来说，却已换了人间。

曹都都记得，仿佛一夜之间，他的父母成了黑帮。他家所在的海军大院里，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大都遭受了批斗和关押，靠边站了，还不时传来谁谁受虐致死的噩讯。王冀豫回忆，他所住的空军大院里，家里的大人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出去“三支两军”了，很多家庭只剩下“留守儿童”。

老红卫兵自己的组织——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等，也先后遭到中央文革镇压。一群奉旨造反、制造“红色恐怖”的未成年人，被挑唆和利用完毕后，摇身一变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那种‘沉舟侧畔’的感觉，当时的民众也许很难理解。”曹都都说。

这些少年身上开始躁动着一种无法无天的暴力倾向，成群结队游荡街头，打架斗殴。

他们之中，“王小点”的名头渐响。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1949年出生于南京，其父王文轩曾任国防部五院（七机部前身）副政委，开国少将，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委员。

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王南生，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欺负人但绝不能被人欺负，要打架就要打胜。曹都都说，他们在外行动，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

文革开始的1966年，王南生在北京翠微中学初三读书，1米8左右的个子，是学校的篮球健将。8月，他和另外6个同学在翠微中学发起成立了红卫兵。“那时候，中学生比大学生有战斗力，初中生比高中生有战斗力。”他说。

失势之后，老兵们开始到处捣乱。按王冀豫的话，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但是还可以收拾流氓。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时候，老兵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大会，有组织地喊出口号：“镇压流氓！打倒流氓！”

## ◇ “小混蛋”崛起

不光是老兵们，在“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最高指示的不断煽动下，几乎各个阶层都被唤起了暴力的潜质，特别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群体暴力倾向。

经过“红八月”残酷打击的玩主（又写作“顽主”），休养生息，开始复苏。他们以地域为界，形成了一个个“码头”，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兼并和冲突。

其中，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混蛋”渐成气候。

“小混蛋”本名周长利，为北京西城区积水潭、新街口一带平民子弟玩主的首领。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1968年的北京江湖》，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周长利的出名并非因为打架凶猛。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领头人一般是不动手的，“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混）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善于策划和组织，名气越叫越响。

“小混蛋”的另一左膀右臂、后来曾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王山（网名“四横竖”）认为，“红八月”过后，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老红卫兵的再造反心理。但起初，由于老兵打流氓运动的余威尚在，顽主方面羽翼未丰，双方基本井水不犯河水。双方的第一战，发生在1967年的6月，地点在西单闹市。

据王山说，事情的起因是：前一天，周长利等人第一次进到属于老兵传统地盘的新侨饭店吃饭，遭到讥笑。当天，他又因戴了墨镜（这被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专利），在西单商场里被老兵羞辱。怒火中烧之下，周长利不问青红皂白把35中的老红卫兵卫×打得头破血流，还抢走了他的军装和鞋。

这之后，双方冲突不断。根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边作军称，在月坛公园，周长利带着两个人靠苏式武装带突围，七八十个老红卫兵没拦住。在紫竹院公园，周长利一方以10人对付80多个红卫兵，不但以少胜多，还抢了对方11辆自行车。

但在王南生等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据他们所知，当时北京没有发生过这等规模的打群架，否则他们“早灭了小混蛋了”。

无论如何，双方积怨日深，确是事实。

## ◇ 导火索

1968年6月间，几天内接连发生的三件事，就与“三校”这个群体直接相关了。

第一次是刘沪生和几个朋友到北海公园划船，结果有人被抢去了军装，还被钢丝锁打破了脑袋。

事后，小邱子带了一个人来到北大医院，塞给刘沪生50元钱。“当时50元钱比工人一个月工资还高呢！”刘沪生说。他问小邱子是谁干的，小邱子不说话，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后来刘沪生才知道，那天跟小邱子一起来的，就是“小混蛋”，他来查看情况。那是刘沪生头一次见到“小混蛋”。

不久，刘沪生和姜晓军、苏新民在西四一带理发，姜独自出去买冰棍，看见小邱子，打招呼间，对方一群人围了上来，问他：你哪的？姜反问：你们哪的？那伙人说：我们是“小混蛋”。姜说：我是“三校”的。那伙人说：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

话音没落，一人从背后给了姜晓军一刀，插在了肩胛骨上，另一个给他大腿一刀，捅断了一条肌腱。

王南生与姜晓军相熟，得知消息后去看他。在他看来，“叉的就是你们三校的”，这是在公然向老兵挑战了。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姜晓军留下了，还撂下一句话：“晓军，你好好养伤，我一定给你报仇！”

冤家路窄。仅仅在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午，还是在同一个地点——西四丁字街，双方就狭路相逢了。

对方用刀顶住王南生的后腰，双方口角了几句，但没动手，本来都要擦肩而过了，王南生突然听到弟弟王毛点的喊叫，扭头看见弟弟正被追打。他把自行车一扔，拿起车上的钢丝锁，迎面冲了过去。

据边作军回忆，他当时从旁边一个木箱子上卸了一根抬把，迎面朝王南生抡过去。

王南生抬手一挡，瑞士手表被打飞了，棍子上的钉子划破了他的肩头和手臂。

混战时，周长利一直没有动手，双手叉腰，独自站在路边观战。打完架，王南生走到他跟前问：“你就是小混蛋？”周长利很沉稳，没动，也不说话。

“你记着，三天之内我要不碎了你，我那个‘王’字立起来写！”王南生说。

当天傍晚，王南生和刘沪生等人去西城公安分局报案。警察提到，他们正要找小混蛋找不到。王南生说：“那好啊，我们帮你们找。找到之后，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可以吗？”对方表示欢迎，但提醒他们，不能打人，可以自卫。另一个警察还补充道：“你们只要不打死他就行。”

因为衣服上都是血，王南生没敢回家，在学校过的夜。大家分头串联，邀约各大院的老兵，第二天一起去找小混蛋算账。

据边作军回忆，当天周长利教训他们：要打又不往死里打，人家肯定要回来寻仇。得，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 ◇ 集结

边作军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6月24日。早上，他和周长利等8个人按约定在北京动物园集合，先在早点铺吃饭，准备饭后乘车去香山。因是出去玩，他们没带家伙，还带着吉他。

但王南生和曹都都确信，那天是6月23日。

王南生清楚地记得，那就是在报案后的第二天。曹都都则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亨得利表店在文革中首次开始卖进口手表。他去排队为家里买表，因此错过了集合时间。

集合地点在王南生所在的翠微中学。早上，老兵们陆续赶来。“小坛子”（姓谭，其父时任工程兵副司令）也来了。“那时候，我们这帮‘三校’的人对小坛子印象不大好。因为小坛子经常跟小流氓混在一起，和小混蛋也很熟。”王南生说，“那时对那些不入流的干部子弟，我们也照样动刀子。”因此，他故意当着小坛子的面大声说：“今天谁也别给小混蛋说好话，谁要是给他求情，别他妈怪我翻脸！”

出发时，大概有二三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伙。一路上，城里的老兵们不断从建工部、国家计委、物资部等大院里出来，汇入车流。据说，最多时达到一二百人。

刚开始，听说小混蛋可能在北海公园一带，队伍涌向北海公园方向。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在北京动物园一带。于是，后队变前队，都往动物园赶。

#### ◇ 遭遇

据边亚军回忆，他最先吃完早点，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解放军旧式军装为黄色），立刻大喊：“他们在这哪！”之后扭头狂奔。刚好一辆公共汽车已经启动，他扒上了车门跑掉了。

当时，动物园的对面是一片商业区，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铁道，铁道边上是条土路，通向二里沟和甘家口之间。周长利和小邱子就顺着土路往西跑。

老兵们追了上去，先把小邱子打倒在地。小邱子躺在铁路上，谁过来都要上来刺一刀。刘沪生看他快不行了，就在那护着他，不让别人再刺他了。刘沪生至今认为：“小邱子挺仗义的，在后面护着，要不然小混蛋跑不了那么远。”

小邱子一共挨了20多刀，后来缝了100多针。据说，那之后他就废了，不再当“佛爷”（即小偷）了，以修鞋为生。

其他的人继续追赶周长利。当时，江小路因参与“粮校武斗”事件，刚被公安局放出来不久，身体虚弱，坐在别人的车架上。他看到，周长利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肌肉发达，“跑起来非常矫健，像一个运动员”。

在103路电车二里沟站前面，周长利被截住了。最先追上来的，是王南生的弟弟王小六，以及建工部、百万庄申区的几个人。他们命令周长利跪下，扒了他的裤子和鞋，摘了他的手表。

周长利突然挣脱开去，只穿着绿色军用线袜朝前跑。老兵们追上去，有人朝他背上砍了一菜刀。他停了下来，一群人骂着，一路推搡着他走。

#### ◇ 重创



王南生赶到时，周长利正被押着迎面走来。小胖子、刘××等人在后面用刀子顶着周长利，王小六夹着他的鞋和裤子。

周长利后背有一道五六寸长的伤口，白衬衫上一片鲜血。“这一菜刀我知道是谁砍的，但当事人不愿讲，我也不提了。”王南生如是说，“不过那一刀只是皮肉伤。”

看见王南生，周长利说：“小点，你的手表丢了，我赔你。”王南生说：“你不用说赔我，我知道你会偷，你的东西都不是好来的。”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推开了。“小点，别跟他废话了！”苏上来就给了周长利头上一锤子。

据后来审讯王南生的公安人员向他透露，根据医院的尸检报告，周长利受了三处致命伤。这是第一处。

跟着，祝××上去，又给了周长利一剪子。“这是第二处致命伤。”王南生说。

这时，他急了，拦着其他人说：“行了，别打了！”他对周长利说：“你跪下！叫红卫兵爷爷！”

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激动，感觉这就像一种“审判”。“小混蛋扑通跪下了，清清楚楚地叫了声‘红卫兵爷爷’。”

周围的人都在嚷着：“小点，让我剁一刀！”“让我给他一叉子！”王南生喊道：“都别他妈打了！他都给你跪下了，还打他干什么？！把他送公安局去！你们走吧，都别管了！”以后，大部队陆续散去。

#### ◇ 最后一击

王南生打算先把周长利送到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正好旁边有个骑车看热闹的路人，刘沪生遂命令他：“你过来！骑车带上他！他不干，说：“这人浑身全是血，我不带他。”刘蛮横地说：“你带不带？你不带他，连你一块揍！”

此时周长利还很清醒，对那人说：“你就带着我吧，弄脏了你衣服，我买新的赔你。”

那人不得已，带着周长利骑在中间，王南生骑在最左边，在他们之间是小坛子。周长利的右边是马猴子，再边上是刘沪生。一群人沿着水电科学院所在的路向海军总医院骑去。

突然，有人拿着擀面杖冲上来，一下子打在小混蛋头上。王南生冲后面跟着的人喊：“你们他妈的别打了，血都溅到我身上了！”

这时，周长利向王南生求情说：“小点，今天放过我吧。”王说：“别废话！现在先把你送医院治伤。完了以后，送你去海淀公安分局。你呀，玩到这儿就算到头了！”

周长利可能不想进公安局，于是又转向旁边的小坛子：“你跟点儿说说，我服了，放过我吧。”

这时，一群人都看着小坛子，眼露凶光。小坛子挂不住了：“你他妈废什么话，你以为我不敢叉你？！说着，一刀扎了过去。

周长利两腿一蹬，身子一下就直了，然后直挺挺地从车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

后面跟着的一些人又拿着菜刀拥上来了。“这是流氓装死！小点，你别管他，我们要打他了！

周长利撑着坐了起来，正好面对着王南生，说了一句：“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救救我，救救我！”说完，扑通又倒下了。

王南生看他身体还在动，喊道：“谁也不许打了！他跑到路边的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的传达室，想借电话叫急救车，传达室的人死活称“电话不外借”，他只好拜托对方给公安局和海军总医院打电话。

这时，有人把他从传达室里拉了出来，让他赶紧走。他对呆若木鸡的小坛子说：“你不赶紧走，这一刀出事了！你记住，什么都别说，赶紧走！”

人散后，江小路才赶来，在周围转了一圈。“心里觉得挺恐怖的，地上好多血。”

等曹都都回家放下表去找队伍时，路遇熟人，说架已经打完了，对方没几个人，根本不堪一击。中午时分，他去海军总医院看了看。门诊楼内乱糟糟的，门外一辆板车上还有血迹。他听说，人拉来时就已经死了。

#### ◇ “流氓杀人犯”

事后，王南生等人顺着运河边回了学校。中途，他让小坛子把刀扔在了运河里。

中午，他们一起到工农兵食堂（即惠丰堂）吃的饭。王南生嘱咐大家：“这事情弄大了，大家要统一口径，都别主动说出去。如果公安局要问，你们就往我身上推。前面的事我都担着，因为我已经向公安局报过案。后面怎么回事，咱们都不知道。”

下午，王南生准备回家，刚到罗道庄，就被两个骑跨斗摩托车的警察截住了。当晚，他和部分涉案者被关进了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之后，他被转到海淀分局的看守所。

为这一案，公安部门前前后后抓了70多人。由于王南生拒不交待，或许还有其他原因，祝××和刘沪生等少数主要参与者，始终没有被抓。

关押期间，在王南生就读的翠微中学、他家所在的七机部大院等，举行了四次上千人规模的批斗会。他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写“流氓杀人犯王南生”。他每次都在台上喊：“我不是流氓，我们是打流氓的！”每次都招来一顿打。后来，牌子上终于去掉了“流氓”两个字，变成“杀人犯王南生”。

当年9月，他与同案的苏××、小坛子、刘××、马天儿、柱子、秦栓儿一起，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叫“黑帮子弟学习班”，后改称为“中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那天被迫骑车带周长利去医院的那人本来与此案毫无干系，可能因为他父亲也是个黑帮，也被关进了这里。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这个“冤大头”叫杨××。

王南生前后一共被关了400多天。1969年底，因一度被打成“叛徒、特务”的父亲获得释放，根据这个学习班不成文的规定，他也获释了。

按照“三天内离开北京”的释放条件，王南生去了外地，在父亲的老部队——40军120师当了兵。

#### ◇ “兵匪合流”

据《1968年的北京江湖》一文所说，周长利死后，北京市的玩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王冀豫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他猜测，这可能指的是其后在江湖中崭露头角的达智桥“菜刀队”。但“菜刀队”的玩主们并未与大院的老兵们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大家时常碰到，还点点头。在王冀豫看来，“菜刀队”实际上吸取了“小混蛋”的教训。

1969年，大院里的老红卫兵们当兵的当兵，下乡的下乡，好勇斗狠的风气不再。后起的大院子弟与玩主迅速融合，进入了王山所说的北京文革历史上极其独特的“兵匪合流”时期。

王冀豫在山西插队时，曾在永济火车站遇到过昔日小混蛋的一帮兄弟。双方都很客气。

这些人多是从新疆跑出来的劳改犯、劳改就业人员，专门在陇海线上扒窃，被称为“吃大轮的”。为向王冀豫演示其神偷妙手，有两人顺手从一个给生产队卖驴的老大爷身上偷了100多元，随后又把钱还给了他。

“他们在向我展示，盗亦有道，这种钱是老头的活命钱，不能偷的。”王冀豫说。

“小混蛋”不死，就混成了“老炮”

“混蛋找我来了”

让王南生等人不能接受的是，至今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仍然认为，他们这些有背景的干部子弟无法无天，可以打死人不偿命。

这一案的涉案人员中，大都被关了一至三年不等。王南生承认，他们中确实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但他认为，这并非因为“优待”，没被重判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责任很难完全分清；二是大都是未成年人犯罪（那天的参加者中，不满19岁的他算是最大的）；三是周长利是被立案的刑事犯。他希望那些认为周长利是對抗权贵子弟的平民英雄的人注意一个事实：这些人身上穿的军衣、手上戴的手表、天天下馆子挥霍的钱，都是偷、抢而来。而且，当年从上到下都提倡所谓的“群众专政”“文攻武卫”，私设公堂、草菅人命的情况司空见惯。

“小混蛋事件”前的1967年8月，王冀豫曾在“粮校武斗”中伤人致死，被关进监狱，后也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据他所知，当时对于文革中未成年人的过失杀人，基本上都没有重判。与他同监的一个姓刘的中学生，因被“黑帮子弟”抢走毛主席像章而杀死了对方，证据确凿，但一年后无罪释放了。“不能用今天的法律观念诠释文革中的乱象。”王冀豫说。

但王南生承认，小混蛋再怎么样，罪不至死。“我们虽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但客观上等于用私刑杀了他。因此，不说在法律意义上，即使在江湖道义上，我对小混蛋也还是有亏欠的。我个人对他的家人表示歉意。”

周长利死后，王山等人一直怀疑有人出卖了他。怀疑曾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因为在动物园转车耽搁了很长时间，就是在等这个人。但是怀疑始终没有得到印证。随着年龄渐长，王山开始有了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个出卖消息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周长利自己。那时，他交了许多老兵朋友，推心置腹，引为知己，甚至不惜为此冷落自己的老朋友。

曹都都一直觉得，周长利阴魂不散。1972年，小坛子重病住院，他和王南生等几个人去看他。小坛子在病床上坐着，手上玩着一把钢丝锁。大家劝他：“你没什么大事，好好养病。”他说：“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事。”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混蛋找我来。”

近年来，王冀豫一直在公开忏悔。他认为，干部子弟里也有渣滓，这些人也可以说是“流氓”。据他所知，一些身背残忍血案的老红卫兵，后来都没能善终。“我是觉得，我们做事，人在做，天在看。恶行总会有报应的，冥冥之中很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

□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第662期

~~~~~  
【当事者说】

都说我打死了小混蛋

· 王南生 ·

我父亲王文轩原来是地下党，他是31年参加革命，32年入党，在山东济南和赵建民他们在一起。山东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之后，由于我父亲直接参与和领导，把党组织恢复了，一直到最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父亲因为曾在白区工作过，当时党组织又被破坏了，我父亲就有嫌疑了。康生当时对父亲的案子有批示，就俩字“查办”，老爷子人就不见了，不是被公安局抓，而是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北京有名的流氓“小混蛋”被打死以后，批斗大会批斗我四次，连我住的院子里都被批斗过。

我小学在“十一”小学上的，因为我小学比较淘气，学习也不好，但“十一”的学习气氛非常好，而我就是学不好。我那时候和胡东平两个人当时是学校里最调皮的，所以我们俩经常放学后被罚拿着小白旗。我从“十一”转到现在我们家的大院对面，原来叫马神庙的小学，转到这儿以前，先转到航天云岗小学，那是住校的，结果学校都不愿要我，我太调皮了，不上课，斗蛐蛐儿，玩性特大。

我考中学的时候，算是及格了，但是按当时学校招收，是根本就考不上的。那时候初中也开始普及教育了，正好被我赶上，就上了翠微中学。翠微中学以前不怎么样，我们去的都是差的学校，比我们学校再建得晚一点的是太平路中学，于是就从我们翠微中学分了一半人到太平路中学去。文化大革命中，“翠微”、“育英”、“太平路”这三个中学在一条线上。“太平路”和“翠微”的渊源非常深。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学校周边都是军队，地方的大院机关，所以很容易大家形成一片。再加上当时外面的形势对中学红卫兵十分不利，66年、67年北京三司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了，很猖狂，到处砸学校、砸红卫兵。“联动”在12月26日成立，当时开了一个红卫兵破四旧立功事迹大会，当时其实红卫兵的想

法都是好的，想总结一下前面的经验。因为那时候中央提出很多问题，我们对很多事情，包括江青提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都有疑问。于是提出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口号改一改，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中央文革”那帮人不断忽悠和利用咱们中学生。

在学校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有些不对，而且说句实在话，咱们那时候也是受了清华附中的忽悠。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杨盘、刘沛，他们几个写了《红卫兵造反精神万岁》，然后是“再论”、“三论”。那时候对干部子女来讲，消息确实确实比老百姓的孩子相对多一点。为什么？干部汇报工作，或者家长在说什么，你有意无意也能听到一些事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候还没有很明确说法。什么人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搞不清楚。等到了8月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多事情不太对劲。那时候红卫兵的运动如火如荼发展起来了，加上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年轻人的心里充满无限的激情，觉得老一辈做的事情，我们没机会做，老一辈没做完的事情，我们要替他们做。那时候是有点脑袋发热，其实里面有很多并不是唯物主义，可是我们哪有那个思想？哪有那么高的鉴别力？

我们到上海，全称是首都南下兵团十六纵队，由郑中伟带队。周总理都支持红卫兵南下，临出发前接见了我们，还给大家做指示，说明了中央的态度。我们去上海是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是拿着尚方宝剑，到那儿造反去，因为上海造反不起来，让上海的工人把造反派都压制下去。工人闹不起来，真正能闹起来的是陈阿大那些流氓。咱们怎么能和他们弄到一起？一问出身，都是市民、小商，那时候咱们觉得小商是属于团结的对象，可以共事的对象，但不是主力。通过我们在上海社会上的调查，和各个学校红卫兵串联，发现上海学校红卫兵的组成成份非常杂，怎么和他们合作呢？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陈阿大这些人反对的，我们肯定不能和你们坐在一条船上，就翻了脸了，咱们在上海就变成“保皇派”了。在上海就和“三司”打起来了，我们把蒯大富的办公室都砸了、抄了。“三司”在上海的指挥部由蒯大富亲自坐阵。我们保上海市委，说上海市委是革命的。而且随着文革深入，我们越往下就觉得越不对，走资派越抓越多，全国每个地方都一样。按这个比例下去，国家早就分崩离析，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还反修防修干什么？这就是我们当时“老保”的观点。

12月26日破四旧大会的时候，我们都在场。辩论关于兰侨的女儿兰小滨抓不抓，说是被抓起来了，如何如何不对，为什么抓人？一开始场面就很激烈，原来说中央文革成员还准备出席，还留出位置给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辩论不休的时候，石油附中上来一帮人，其中有贺邯生、郭大勋，他们都是老高中，比我都大，现在都退休了。每人拿张纸，上去发言非常尖锐，说第一，“一切单位、一切部门要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这是他们当时提的口号，“反对中央文革篡夺中央军委的领导”。一共提了十几条，其中比较过激的就是“炮轰公安部”、“油炸谢富治”，当时算是最过瘾的了。其他就是反对“三司”乱抓人，反对公安部权力下放。为什么这么提？因为公安部把权力下放，“三司”可以随便抓人，而且“三司”和老红卫兵第一次的冲突，结下了梁子，当时“三司”抄了何长工家。何长工是老革命、老同志，二几年的老党员。你凭什么抄人家的家？“三司”要斗人家，红卫兵就和“三司”干起来了。“三司”最早的头叫朱成昭，这人和我关系还不错，他也是老大学生，他后来也说实际上我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我们把这些老同志都保起来了，我们以批斗为名把老同志保起来。从中就能够看出老百姓的心理，不喜欢抄家这种做法，我们也同样。我们主要调配的力量都在外面，怕“三司”来会场闹，后来说“三司”不会来了，因为中央领导人要来，可是后来这么一闹，中央领导不来了。

实际历史上“联动”根本没有成立，只是准备成立。八个学院大学的附中，加上东城、西城当时的纠察队，商量要搞联动。最后弄得不清不白，现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联动”如果成立的话，就要有纲领，要有组织。当时确实形成了一股思潮说联动臂章、分等级，纯粹都是胡扯淡。

文化大革命毛主席“8·18”接见学生的时候，说是保卫毛主席红色革命路线的卫兵，简称红卫兵。搞红卫兵的时候，我、杨渝生、吴国晓，我们几个到各学校去座谈，听听他们对红卫兵的认识，考虑我们学校到底搞还是不搞、干还是不干，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串联串联。我们觉得听了挺受震动，就回学校忽悠去了，也要弄红卫兵。其实当“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以后，红卫兵的士气基本上被打下去了。北京红卫兵无论到哪儿，到广州，人家抓“联动”；到武汉，人家又是抓“联动”。北京的红卫兵，到哪儿都被人家冠以“联动”的人。只要是“联动”，人家就打你、抓你，就活该。那时候“三司”更猖狂，哪个学校都敢砸，只要是老红卫兵掌权，他们就敢来砸。他们就恰恰不敢砸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在上海串联的时候，我们和北京体院的人在一起，在上海和人家打仗，我们比他们还能打，所以关系还挺不错。因此翠微、育英、太平路，我们三个学校就没有被抄。我们和“三司”打了几场架，我们都是打赢的。67年联校武斗，我们这帮人在北京打架都已经打得挺棒了。“三司”来了，人还没有下车，打得他们掉头就跑。

中学红卫兵初中不像高中，有高中的学校都不灵，老是压制着想打架的这些人，要讲策略，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相信党。可是我们一打就出名了，好多附中的孩子们跑到我们学校来集合，一天到晚集中在我们学校。我们中学的地理位置有一个靠近军队大院的优势，离得最近是警卫二师，然后是空军、海军，中间还有通信兵、总后、后勤学院，然后是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这边是农政农办。各大院的子弟大多集中在翠微。56中也不灵，有高中的学校都不灵，没有高中的学校就来我们这里集合，我们这里安全，而且我们老是声援人家，我们帮着去打架。

后来三校联防，三校联防其实在北京的中学生里面挺有名的，就是翠微、育英、太平路，一家有事，两家支援，而且都有人住在学校里，都不走，有事打电话叫人。我们最远砸到四十七中，也是当地的造反派把老红卫兵打得不行了，我们把他们学校给砸了，把人家的报大字报也撕了。跑到北航，又把北航砸了。那时候就挺厉害的，我们晚上出去，在长安街刷标语，我们有准备，自行车后面有木枪、垒球棍。“三司”的大卡车过来，我们不等他们下来，隔着车就往上砸。那时候不知道砸车玻璃，要是砸了车玻璃，一车的人不都得扔这儿了？

下面谈谈打小混蛋的事，现在网上博客说的不是真的，我都不认识这些人，还说我和他们一笑泯恩仇，那全是扯淡。我这个人不和流氓打交道，为什么？那时候因为当时老红卫兵已经不行了，小混蛋见了老红卫兵就抢，老红卫兵的标志就是军装或者军帽，因为家里都是军人。他们不光抢军帽，而且拿刀子捅人，都是他们先干出来的。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破四旧，打流氓的时候，咱们也没有拿刀捅人，只不过是拿垒球棍或者拿木枪、拿皮带打流氓。直接拿刀是从流氓开始的，他们背着军挎包，夹着刀，军挎包里搁报纸，裹一菜刀，拿着菜刀见人就砍，谁受得了？完全是暴力，是有针对性的。而且还不仅仅只是抢老红卫兵，这些人上公共汽车以后，就偷钱包。北京人过去叫佛爷，就是小偷，还明抢，拿刀就捅，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公安局都有记录的，谁都推翻不了。并不像博客上说的，是高级干部子弟和平民老百姓的孩子打架，而且我们打流氓的时候，不都是干部子弟，也有工农子弟参加我们的，而且到现在都保持很好的关系。也不都是高级干部子弟的孩子。捅小混蛋是有这么一回事，不假，但是这件事情绝非是高级干部子女干的。流氓是为了煽动老百姓支持他们，不光

排挤老同志、老干部，还有他们的子女。其次咱们自己家的父母，当时都不愿咱们去做官，咱们升官了，父母还要给单位写信，“我的孩子还要再锻炼”，都不同意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那时候真是两袖清风，我们请人吃饭，都是请人家到家里来，买菜做饭，请人外面吃饭也是自掏腰包，哪有去报销的。

卫星，三十五中的，原来打篮球的，也是一个干部的孩子。这件事我没有和卫星核实过，但是他确实被小混蛋捅了一刀，这是真的。卫星这么高个，小混蛋说你低下头来，让我砍你一刀。这是人家传说的，但是我知道他确实是被打了，而且是被小混蛋打了。我有一天正好和小混蛋碰上，起了摩擦。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当时我们吃了点亏。咱们不是怂人，咱们不是被他们打跑，咱们是把他们打跑了。为什么说咱们吃了亏？因为我的表被砸丢了，还被砸伤了。一块板子有根钉子，刮了我一下，我们当天晚上就到西城分局把这件事报了警。

第二天，我和小混蛋讲，我说我告诉你我是谁，你记住，三天之内我要不把你碎了，你把我的姓立起来。我不是姓王吗？翻过来还是姓王。三天之内，你等着。当天晚上就召集人，何止三校，连地安门的总政、总参两个大楼的孩子都通知到了。咱们准备进城搜这帮人，谁搜到了就通知一下，我们学校有人值班。最后发动起来了，转了一圈没找到。我们通知各个地方，第二天早上7点多，自行车碰头，夹着木枪、夹着垒球棒，拿着工兵锹，拿着菜刀，拿着钢丝绳，全副武装。我们是以三校为主开始行动了，小混蛋的人也都在动，知道我们要打他们，也出来了。在车站那儿有十几个人，一看我们一片，自行车飞着过来，就开始跑。从汽车站过去有一个土路，他们顺着土路跑，我们就追。捅了不少刀，砖头砸的就更不用说了，都快被砖头给埋起来了。当时非常简单，跪下，叫红卫兵爷爷，我连手都没动，小混蛋扑通就跪下了，冲着我们叫爷爷。谁说小混蛋硬得像个汉子？那是吹牛。木枪都很结实，刺杀用的木枪，还有垒球棍，有的拿菜刀剁，有的拿叉子捅，捅得他一跳一跳的。路上，有人多事，给了一刀，两腿一伸，临死的时候还说“我都叫你们红卫兵爷爷了”，意思就是说我都求饶了，干嘛又打我？

博客上全都是编的，而且我当天下午就被抓起来了，我进去非常坦然，我是为民除害。第一，我做的事是好事，我是为民除害；第二，我和公安局已经讲过了，我报了案，我先是受害者。第三我已和公安局讲了，我们是要给小混蛋留口气送过来。我们是打了他，我们想把他送到海军院，包一包再给你们送过来，我们都是好意。中间怎么回事？咱们也不知道。他名气太大了，当时人多，混乱。谁打死的？你找谁？不知道，我就没认帐，但我就一直扛着。我后来被关到北园少年犯管教所去了，现在公安局老的退休民警，也都说打死小混蛋是义举，为民除害。打死小混蛋的时候已经是68年，北京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西单商场爆炸，这是轰动北京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说我打死小混蛋，刀劈小混蛋，和说评书一样，其实我根本没动手，人家都不了解情况。第三件事是68年红卫兵上山下乡，是8月份。我们是6月份打死小混蛋的，6月底、7月初，第一批就走了，去黑龙江。这是68年三件大事，香港、美国一帮人说要写《北京传奇》，人家也找了我。

那时候很多人都在家里赋闲不出，在家待着，一说打小混蛋，都出来了。平常在家里温习功课，都不温习了，真的，平常都不到学校来的，早早就都来了。我们当时也认为小混蛋是社会上的一股邪气，我们也要煞一煞这股邪气。因为68年前，很多人家都被抄家，或者父母被关，也有的父母都自杀了，或者被整死的，生活来源都没有。干部家穷，不知道理财，老头子都是农民过来的，有几个会理财的？全都是公家的，没有自己的，一抄家，让你搬出去，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真有干部的女孩子和流氓混在一起，为了吃饭，为了生存。因为那时候没有工作，学生到哪里找工作？脚还没从学校踏出来，在学校里就开始文革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恶举是什么？抢人家鸽子，人家养得好好的鸽子，抢过来。我曾经抢过北京最有名的人，摔跤界的，我还跟人家学过摔跤，都是因为抢了他们鸽子才认识的。认识之后，关系处得还挺好。打小混蛋以前，因为抢鸽子，认识了很多名人，就混得名气越来越大。但是有一样，当时兴拍婆子，这件事咱们没干，为非作歹的事，咱没干过。还有，文革中我没有和干部的孩子打过架。我以前上小学，经常在学校里欺负同学，小学的时候是小霸王，调皮捣蛋、打架、欺负人，都是我干的事。低年级的人打完了，没人敢打了，和高年级的打架。学校能容我吗？而且还是我先动手。可是文革中，因为干部在文革受到的冲击和受到的压力，只要对方也是干部的孩子，咱们就偃旗息鼓，因为那时候也有大院和大院打架的事情。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院里的孩子张保佳，父亲张汉英，他经常被周边学校里的孩子欺负。我们院里的孩子都很老实，我看不过去，我把张保佳叫过来问，那个人不是老欺负你吗？你恨他吗？张说，恨。我说，那你打他。张说，我不敢。我说，你要不敢，我让他打你，下回他见你，再打你，没人管你。我先让你打他，他要敢打你的话，我弄死他。张憋足了劲跳起来，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我说，我给你撑着，他不敢找你。之后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这是最开心的一次。到现在，他说这辈子干的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的这一个大嘴巴子。人家老欺负张，几年下来一直欺负他，又向他要钱。打了以后，还叫他小流氓，以后我看你还敢欺负张不？以后都没人敢欺负张了。被打的人肯定觉得冤得慌，那你干嘛平时欺负人家？你不欺负人家，谁打你？你这叫自作自受。张一定觉得我特义气，帮他出了一口恶气。

我为了小混蛋的事，被关起来，关了很长时间，400天，一年多。在分局里，我被批斗了四次，万人斗争大会，而且我每次被批斗，都是被打得鼻青脸肿。那时候学校都已经开始静下来复课了，有街道的人、有学校的人，每回我都是第一个被押上去，说我是“流氓杀人犯”。我不服气，在台上我就说，我不是流氓，我是老红卫兵，我们是打流氓的。批斗说我不老实，揍我，每回都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还就没有怂。多少人在台下看，这也是我出名的又一个原因。第四次拉我到总后去斗，我挨完斗，被人家踢得我脸都变形了。人家说这还能拉出来批斗吗？就别拉了，我才躲过这一劫，要不然我得被斗五次。

从那以后被转到学习班里，我坚持不认罪，我没罪，有什么好认的？我是为民除害，我和公安局讲过，我也没干嘛，我是组织人抓小混蛋。年轻人火气方刚，控制不住，咱有过失，但是咱没罪。我们那个学习班主要是让你交代，你反动的老子和他们那一层人的社会关系。贺鹏飞，他们家四个，加上贺龙的侄子贺晋州，五个人都和我被关在一起。他们从青岛坐船去大连，说人家要叛逃到南韩去，通过公海游到南韩。这是人们在想象，人能游那么远吗？当时人的思想都扭曲了，什么都可以栽赃陷害。

陆德怎么会被抓起来的？他是高干子弟辩论团的团长，团员也是他，就他一个人。他写了大字报，被抓起来了。陆德那时候是现役军人，党员，在清华大学进修。最小的是谭震林的儿子，13岁，罪名是烧国旗，他在教室里升炉子取暖，把课本撕了。撕的时候，书里第一页就是国旗，罪名可大了，抓起来了。老干部受冲击，连13岁的孩子都抓进去了。

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太艰苦了，吃窝头，根本吃不饱。吃饭时，怕窝头渣掉了，还拿手绢包着，掰开窝头的时候，掉的渣都在手绢里面，一股脑都倒进嘴里，饿得不行，汤锅被刮得锃亮，也不知道怎么刷得那么干净，连一滴油都找不到。熬的菜就和水一样，连一滴荤油都没有。就是给干警们炒完菜的刷锅水，不是也应该有点油腥吗？被抓起来的时候，我体重差不多130多斤。放出来以后，才一百零几斤。后来去当兵，每天早上出操，连50米我都跑不下来。从监狱回家，第一天吃得我上吐下泻，打的嗝比放屁都臭。

到“学习班”还好一点，但也不行，我突然胖到157斤，吃起饭来不知道饱，吃得太多。一天拉三次屎，整个肠胃都坏了。我常不服气，不服管，怎么办？所以我在学习班经常受惩罚。北园少年犯学习班里的小号，外面就是铁栅栏，只能坐着，头都抬不起来，或者干脆躺着。上厕所，走一脚，一跟头就出去了，一天两次。戴铐子太遭罪了，那是铁与肉的关系。咱们到了共产党的监狱，才知道什么是铁与肉，咱们是肉。想到那些被整死的老人，他们受的苦更可想而知了。我在学习班里面不认罪，天天组织关在一起的人批斗我。他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我每天早请罪、晚汇报，是向学员们汇报我今天有什么反动思想。我哪有那么多思想？我一直被批斗到什么时候？难以想象。今天上午在批斗我，中午吃完饭，突然通知，让我收拾行李回家，而且限时三天离京，销户口。我就去当了兵，也挺苦，但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

我父亲被查了几年，查不出历史问题。他是55年的七级少将，31年参加革命，32年入党。我爸以前当过教员，所以文化程度较高。我爸没有当过红军，他是地下党。军历差，但是职务并不低。我父亲是三野组织部部长，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是上海军管会秘书长，陈老总任的时候。50年父亲被调到军委，任军衔处处长，那时候还没有军衔。后来到总干部特种兵部二部当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一肚子气，很多事不能理解。父亲是典型的山东人，耿直、犟。在批林批孔的时候，陶鲁笈主持国防科委工作。在京西宾馆开会，陶说怎么没有听见我父亲发言，我爸爸在台下坐着，腾地就站起来，表示对文革强烈的不满。

咱们原来真是太天真了，虽然对社会的奇形怪状有很多看法，对现在有很多不满，可是说实在话，咱们从骨子里既爱党，又爱社会主义，更愿意为这个党去献身。咱们自己说自己，没什么，别人骂咱们，听了就不高兴。我们想想很多事情确实该骂，就像咱回家和父母吵架，没什么，别人和咱们父母吵架，我就不干了，恨不得拿刀劈人家。我们受党的教育，这种基本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很难再更改。

父母都经常告诫我们说，生活上的错误是小错误，但是生活上的错误是最臭的错误，真的是这样。比如咱俩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没有结婚，组织上没有批准咱俩结婚，咱俩就先办事了，就要受到党内警告。那时候都是非常严格的，人们自己也很严谨，也不会轻易去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大家应该在另外一个点上考虑文化大革命怎么就搞起来了，搞得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还有儿子检举父亲的。毛主席还说这是好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所谓的“斗争的哲学”，可以休矣。

□ 来源：《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二集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